

西安发现十六国时期墓葬

7 月 15 日,记者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了解到,考古人员在西安市新城区发掘了一座十六国时期墓葬。墓葬系斜坡墓道单室土洞墓,结构保存完整,随葬器物丰富,共出土陶俑及各类器物 60 件(组)。该墓的发现为关中地区十六国墓葬布局研究增添了新的空间坐标资料,也为这一时期俑群特征、器物组合、丧葬习俗等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墓内出土器物种类丰富

2023 年 5—6 月,为配合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长乐东路区域改造项目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该项目地块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项目位于长乐东路以南、华山路以北,此次在该项目地块东北部发掘了一座十六国时期的墓葬。墓中随葬品组合完整,为研究关中地区十六国墓葬俑群构成、随葬品组合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该项目负责人王昕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该墓虽遭扰乱,但出土器物种类丰富,以陶俑为主共计 60 件(组),可分为人物俑、出行乘具俑、家禽家畜俑 3 类,人物俑种类丰富,有骑马俑、武士俑、男侍俑、女侍俑、鼓吹俑、女坐乐俑,其中女坐乐俑共 4 件,形制、大小基本相同,唯有所持乐器与手势不同,乐器有鼓、箏、琵琶和竖笛;出行乘具俑包括轺车、卷棚车、鞍马和铠马;家禽家畜俑包括陶猪、陶狗、陶鸡。另有磨、碓、仓、井、灶等庖厨模型明器和陶罐、泥饼、铅饰、鹅卵石等,器物保存较好。



陶卷棚车

合欢帽骑马俑

墓葬年代应在前秦晚期至后秦早期之间

考古人员表示,墓中出土的随葬品组合也较为完整,包含有关中地区十六国墓葬常见的出行、伎乐、禽畜、庖厨明器等器物。其中,十六国墓葬出土的女坐乐俑形制与坡刘村、焦村区域墓葬出土的同类陶俑相似。坡刘村发掘的墓葬墓主信息明确,年代被推定为前秦初年或稍早时期。十六国墓中出土骑马俑、武士俑、鼓吹俑、铠马等器物,这类陶俑虽不见于坡刘村那座前秦早期墓葬,但在梁猛墓、草厂坡区域墓葬中有所发现,且武士俑形制基本一致;合欢帽男俑、武冠男俑的造型也与梁猛墓出土器物相近。同时,十六国墓的陶牛、陶马、骑马俑均无配套踏板,带踏板的陶俑特征则出现于平陵、凤栖原两处墓葬遗存之中。考古人员在综合对比器物特征后初步判断,十六国墓年代应晚于坡刘

村前秦早期墓葬,早于平陵出土带踏板陶俑的墓葬,与梁猛墓、草厂坡墓葬时代大体相近。结合现有十六国墓葬分期研究成果,十六国墓年代大致处于前秦晚期至后秦早期。

王昕晗表示,以往关中地区发现的十六国墓葬主要集中在长安城西北的咸阳石安原,其次是在长安南郊的少陵原、凤栖原、高阳原、细柳原一带,其余区域多为零星分布。此次十六国墓葬的发现,为关中地区十六国墓葬的分布提供了新的资料。而该墓出土的合欢帽骑马俑、武官骑马俑,以及由击鼓俑和吹角俑组成的鼓吹立俑,在过去也十分少见。部分鞍马、骑马俑的马具及彩绘保存较好,为研究当时的马具与装饰提供了资料。女坐乐俑组合丰富,出行乘具、步骑从仪卫俑齐备,家禽家畜俑、庖厨明器组合完整,为研究关中地区十六国墓葬俑群构成、随葬品组合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任俊丞

西安市长安区发掘两座中晚唐时期墓葬

7 月 16 日,记者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了解到,考古人员在西安市长安区项目用地内发掘了唐杨绶与其夫人长孙氏合葬墓和扶风班氏墓。两座墓葬形制完整、纪年明确,出土陶俑数量较多、种类丰富,为研究和复原中晚唐随葬陶俑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两墓所出墓志对中晚唐下级官吏的丧葬制度、中晚唐夫妻分葬与婚姻家庭关系以及唐代女冠与道教文化等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纪年墓志出土完整还原两位墓主身份

2022 年 5—6 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西安市长安区航天城羊村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内发现的古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区位于神舟大道与航天南路十字东北角,东临神舟六路,南临航天南路,西临神舟大道,北临羊村路。共发掘古墓葬 11 座,其中,唐杨绶与其夫人长孙氏合葬墓和扶风班氏墓保存完好,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该项目负责人史晟介绍,两座墓

葬均出土形制完整的墓志,借助墓志,考古工作者明确了墓主信息。其中一座的墓主名为杨绶,字灌玉,弘农华阴人,是东汉太尉杨震的后裔。杨绶高祖是唐海州长史杨静,曾祖是唐博州堂邑令杨朗,祖父是寿州安丰令杨修烈,父亲是同州澄城尉杨晃。其是家中的次子,22 岁中进士后调补宋州单父县尉,后受到亳州刺史郭降赏识,任太常寺协律郎,充当州防御判官。郭降升任京兆少尹后,杨绶又任鄠县尉,秩满授长安主簿。享年 50 岁,病逝于长安永崇里的宅第,葬于贞元十二年(796 年)。考,诸州上县中县尉属从九品,单父县尉应属从九品;太常寺设协律郎二人,正八品上,防御判官属于防御团练使的属官,不见品秩;鄠县属关内道京兆府京兆郡,京兆所属诸县之县尉设二人,正九品下;长安为京县,主簿设二人,从八品上。因此从杨绶墓志终官来看,其官阶不会高于八品。杨绶夫人长孙氏,其父是尚书仓部员外郎赠给事中孙铸,母亲为扶风夫人窆氏,卒于元和元年(806 年),享年 52 岁。长庆三年(823 年)十月四日合葬,距杨绶下葬已有 27 年,距长孙氏去世已有 17 年。

另一座墓主为扶风班氏,为楚令尹之后,世居忻州,16 岁嫁于刑部尚书王昂,50 岁入道成为道教徒,62 岁离世,贞元十二年(796 年)十月十六日归葬京兆府万年县高平乡凤栖原。墓主人正史无载,两《唐书》中关于扶风班氏一族记载唯有班宏一人,班宏所处年代与墓主人相近,班宏第五子班露及其妻李氏墓志亦在西安市长安区郭杜镇出土,与该墓位置相近,可作为墓主身份的参考之一。其墓志提及墓主人丈夫“刑部尚书王公

昂”,在《旧唐书》中有简要记载。“王昂者,出自戎旅,以军功累迁河中尹,充河中节度使”“永泰元年正月,检校刑部尚书知省事,改殿中少监”。扶风班氏未与丈夫合葬,可能与其入道修行以及王昂最终“过硤江,坠江而卒”有关。

扶风班氏墓为研究道教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

史晟表示,考古人员除根据墓志得知扶风班氏为道教徒外,墓内出土的高髻俑、巨耳立俑、盘角鹿等罕见形象应与道教教义多有关联,这些形象也进一步证实扶风班氏为道教徒的身份。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是道教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国家对道教的推崇,使得教众增多,随着大量宗室女子入道修行,唐代女冠数量也大幅增长。考古人员根据墓志得知,墓主扶风班氏为唐代女冠,墓志用词多体现道教文化,墓志中提及的咸宜观,《最新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中记载其位于亲仁坊西南隅。《南部新书》载“长安士大夫之家,入道尽在咸宜”。

此次发掘的两座墓葬,其特征皆具有中晚唐时期的特征,墓内出土的明确纪年墓志丰富了西安地区的中晚唐墓葬资料。不仅如此,墓中还出土了大量种类丰富的陶俑。此外,扶风班氏墓所出墓志对补充中晚唐夫妻分葬与婚姻家庭关系、唐代女冠与道教文化等内容都有重要意义,墓主深谙道法,其陪葬品也为研究道教文化与神话形象、人物形象等提供了新的重要线索。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任俊丞

本组图片均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提供

陕西考古发现

时评

从空间再造,到业态融合,再到机制创新,新型公共文化空间不断涌现,成为近年来公共文化服务能效跃升的生动注脚。

从长期废弃的采石矿坑,到文化新地标,变化何以发生?

山东威海环翠区小镇村,依山就势,将下陷的矿坑改造成舞台,缓坡段铺就阶梯观众席,一个“山野剧场”就此落成。随着多种业态入驻,矿山实现新生。

“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如今,在许多地方,我们正与文化不期而遇。

北京钟鼓楼旁,一座“时光小院”吸引游客感受老城烟火;陕西安康,绿水青山间的“秦岭书屋”,让人们抬眼看青绿、俯首品书香;重庆北仓文创街区,老仓库变身图书馆、艺术空间,工业记忆与文艺气息在此交融……

有创意、有颜值、有温度,如今 4 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遍布城乡各地。与传统公共文化空间相比,新空间,“新”在哪儿?

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场域之新。

新空间往往是以新模式盘活旧资源、新内容填充旧空间。或嵌入社区、公园,或改造老厂房、旧设施……这样的建设方式,既让新空间承载独特的城市记忆与景观价值,也把文化功能更好嵌入生活场景,让人们随时随地都能享受文化。

新空间,还实现了文化功能“多元共生”,彰显业态之新。

云南昆明的“春城会客厅”,不仅能读书,还能看展、逛集市;湖北潜江“播动潜江文化驿站”集直播培训与实践、社区阅读、文创产品展示等于一体……沉浸式、复合型

7 月 15 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外卖诗人”王计兵将大奖收入囊中。数日前,鲁迅文学奖提名作品公示,作为新大众文艺的代表,“外卖诗人”王计兵的《低处飞行》获诗歌奖提名,“菜场作家”陈慧的散文集《在菜场,在人间》入选散文杂文奖提名作品,引发广泛关注。

王计兵的诗,写在送货单和废纸壳上。他在等餐的间隙、等电梯的几十秒、等顾客开门的一瞬间,把脑子里蹦出来的句子随手记下。近六千首诗,就是这么一笔一画“赶”出来的,他因此自称“赶时间的人”。

而陈慧,在浙江余姚的菜市场摆摊,凌晨四点起床,九点半收摊,摊子旁边就是她观察人间的窗口。菜场里杀猪的、卖鱼的、讨价还价的大妈、蹲在墙角抽烟的老汉,一个个都被她写进了书里。

评委们的选择释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文学的生命力,或许不只在书斋的安静里,还在电瓶车后视镜里,在菜场的吆喝声中,在每一个普通人喘息的缝隙里。

这些年,文坛有个怪现象。有的作家越来越“宅”,躲进书斋玩弄文字技巧,写出来的东西精致

以新空间滋养文化味

的新场景,让文化体验更加有滋有味,也让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需求都能得到满足。

文化空间焕新,离不开机制创新的托举。过去,公共文化服务多由政府单一供给,如今,政府引导、市场发力、社会参与,供需高效对接。比如,一些城市的城市书房,面向社会征集“合伙人”,有的书房直接开在咖啡馆,店员兼职“图书管理员”。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依托城市书房、社区文化驿站、文化长廊等发展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提供更多群众身边的文化服务。”从空间再造,到业态融合,再到机制创新,新型公共文化空间不断涌现,成为近年来公共文化服务能效跃升的生动注脚。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持续向社区、乡村、商圈等

延伸,正是要破解“最后一公里”问题,促进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惠及更多群众。浙江嘉兴中山路上的老建委驿站,书籍满目、访客不断。这个落在城市一角的驿站,让文化爱好者有了个诗意栖居的空间,让每一个人的诗意都能得到安放、每一份文化渴求都能得到满足,“家门口”的文化新空间,大有可为。

文化新空间建设,核心是服务人,本质是文化供给,关键在于思路创新。江苏扬州,当地瞄准年轻读者创业、就业需求,让城市书房变身“AI(人工智能)创业者的第一间办公室”。基于需求反馈与用户画像,提供高质量、差异化的文化服务,有利于释放出新空间价值,实现人文与经济的有效结合。

展望未来,更多公平可及的公共文化服务,必将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让精神的力量在亿万人民心中蓬勃生长。

来源:《人民日报》作者:张凡

烟火入诗 人心成文

漂亮,却跟真实的生活隔着一层玻璃。看着热闹,伸手一摸,凉的。这叫什么?这叫“悬浮”,叫“失重”。文学一旦脱离了“地气”,再华丽的辞藻,看上去终究是少数人的自娱自乐。

王计兵和陈慧最大的本事,就是“在场”。王计兵有一年因送餐纠纷被罚款后,愤懑中写下“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几行诗,这样的句子,编是编不出来的。陈慧说:“我的写作并不比摆摊高级。”所以不管是不是入围国家级文学奖,她都不会放弃摆摊,因为生活才是最重要的。他们的文字,写的就是自己的日子,苦是真的苦,滚烫也是真的滚烫。

快递员、菜贩子,文学的人生宁有种乎?真正的好文学,既要有书房里的静思,也要有热气腾腾的烟火。当越来越多的王计兵和陈慧被看见,文学的土壤才算真正松了土。当下,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文艺现象纷纷涌现,“新大众文艺”发展得如火如荼,今年更是首次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写作的黄金时代不在远方,就在每个人站着的这片土地上。

来源:《浙江日报》作者:陈江